

我曾在高山之巅上遥观全景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6)

1967年4月4日，在距离金恩被暗杀的整整一年前，他在纽约市“纽约河边教堂(New York Riverside Church)”的演讲中挺身而出，指责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战争行为，是“有如美国占领下的殖民地”和“美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力代办”。

这篇演讲，是金恩对外界流传说他是共产党同路人的答复，这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声明他对越战和共产党立场的演讲，所以特别的重要。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金恩对真理的向往，倒不如说这是一份他对美国政府的道德起诉书，或者说是美国越南政策的清算文。

金恩首先声明，他这次用“来自燃烧的内心”的演讲来“打破沉默”，是基于他自己良心的召唤，他演讲的对象不是越南共产党，不是“越共的国家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不是中国，也不是苏联，而是他自己的美国同胞。金恩毫不掩饰他对美国政府错误立场的失望，他抨击美国政府说：

“我们指的是已经被我们社会伤残了的年轻黑人们，把他们派遣到八千里外去保证东南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美国乔治亚州的东南区和纽约哈莱姆区东区里却找不到。我们在电视上重复地看到年轻白人与年轻黑人一齐被杀死的残酷而又讽刺的画面，可是他们却不能在自己国家的同一所学校里坐在一起读书。我们看见他们团结而野蛮地焚烧穷乡僻野里的草屋，可是我们察觉到他们甚至不能住在芝加哥市的同一条街上。”

金恩又说：

“我们要为那些被我们国家称为敌人，但却成为我们国家受害人的那些弱小者、无声者说话，并为他们伸张正义，没有人人为的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兄弟。越南人民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与日本人和法国人斗争了数十年，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于1945年宣布独立。

即使他们在自由宣言上引用了我们的《独立宣言》，荼毒国际环境多年的西方人的傲慢，使我们的国家认为越南人还是不能独立，所以我们不但拒绝给予他们外交承认，还支持着法国重新征服他们的前殖民地。

在这个错误的决定下，我们丢弃的并非是由中国所扶植的政府，而是由包括一些共产党在内的当地土著所寻求的革命自决政府。为了农民，这个新政府进行了农民生活中最需要的土地改革运动。1945年之后的九年，我们依然承认越南人民有独立的权利，但我们依然用九年的时间去支持法国将越南重新殖民化。在越法战争结束后，我们承担了他们80%的战争费用。

法国人在遭到奠边府战败前，就开始对越南改善他们的鲁莽行为，可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在法国人表现出对越南战争失去兴趣时，我们却拿出大把的钞票和武器，来鼓励他们维持这场战争，结果是我们几乎承担了这场重新殖民越南的悲剧战争的全部费用。

法国人被打败后，通过日内瓦公约，看出越南独立与土地改革可能得以实现，但是美国觉得不应该由胡志明来统一这个临时分裂的越南。越南农民又一次目睹了我们选择并支持了最恶毒的，使农民见而畏缩的现代独裁者吴庭艳首相。

越南农民再次目睹着美国支配的吴庭艳，将反对者残忍地连根拔掉，大力支持横抢乱夺的地主，并坚定地拒绝和北方和平统一谈判。

在吴庭艳的鼓动下，美国增军至越南，替他镇压起义的农民。吴庭艳成功了，但是这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土地与和平的改变，唯一的改变是来自美国。我们为了支持那个不可思议的、没有多数人民支持的贪污无能的政府，而大量的增兵。

那些因为看见我们宣传单上的和平、民主与土地改革诺言而相信我们的人，目前正在我们的炸弹下调萎，他们认为我们和他们的越南同胞一样，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他们悲伤而冷淡地任由我们把他们放逐到连普通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集中营里，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否则会被我们的炸弹毁灭。那些以老人、女人和孩子为主的老百姓只好这样走下去。

他们看着我们在他们的水里下毒，毁坏他们百万亩的农耕地。他们为那些被如雷般响的推土机铲平的贵重的树木而哭泣。我们每杀害一名越共，他们就得牺牲二十条生命。到现在为止，我们大概屠杀了一百万百姓，大部分是孩子和老人。

那些数以万计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小孩子，像动物一样到处在乡间游荡。他们见到小孩子向我们讨饭时却被我们的士兵当作有恶习的小东西的场面，他们向我们的士兵出售他们的姐妹，为他们的母亲拉皮条。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两件最珍贵的体系：家庭和乡村。

我们与他们合谋地将全国唯一的由非共产党革命政治力量统一的佛教庙宇打破得支离破碎。我们支持西贡农民的敌人。我们蹂躏了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屠杀了他们的男人。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坚硬的建筑物剩下来了，只有在我们的军事基地里，和集中营里加固的碉堡，是唯一能找到的可以称为坚硬的建筑。

我们必须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提出他们无法提出的疑问：如果我们要在那里兴建些建筑物的话，农民们就一定会又跑掉。

我们能怪他们有这种想法吗？他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啊！可能最困难的也是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为那些被我们指定为我们的敌人的人说话。那个匿名的‘国家解放阵线’，莫名其妙地被我们呼之为‘越共’，或者‘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美国允许残忍的吴廷艳进行压制人民就是美国在南部的反对团体？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的放纵暴力会促使他们拿起武器？他们只是准备战争而我们就称之为‘来自北边的侵略’？他们又如何会相信我们的正直无私？我们一边在那穷凶极恶的吴廷艳所掌握的政权下对他们使用暴力，一边又将每一个最新式的致命武器倾泻到他们的土地上，还控诉他们在使用暴力？

我们的官员明知共产党的人数不足 25%，而我们却全称之为共产党，他们会如何来评价我们呢？为什么我们明知那个高度组织的政党已经掌控住越南主要的地区，而我们却允许在全国大选时将之排出局外？他们会问：为什么当西贡的新闻机关被军事团体把持和控制后，我们却还在说这是一场自由选举？他们不由自主的会诘问：我们计划着帮助建立的新政府里，并没有那个真正与农民紧密联系的政党参与，又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政府呢？他们会诘问：没有他们参与就横加拒绝的和平协议，我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令人恐惧的有关疑问。我们的国家是否计划着在一个新的暴力政权之上来建立政治神话？在越南北面，我们的炸弹像雨一样倾泻到大地上，我们的水雷布满了水面，我们终于得到了可以理解的严重的不信任。

由于缺乏信任，他们已经在深深地怀疑我们真正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在河内，那位领导着国家对抗法国与日本而取得独立的人，那位在寻找将越南于法国联邦(French Commonwealth)的人，又一次被软弱的巴黎和其殖民地的陆军所出卖。

他们相信《日内瓦协议(Geneva Agreement)》，放弃了第二次对抗法国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将得来北纬 13 度到北纬 17 度平行线土地。1954 年，我们为了防止胡志明胜选上台执政，而与吴廷艳勾结起来使选举流产。他们目睹了一切后，知道又被我们出卖了。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参与谈判时，难道我们自己就忘了这些事实吗？

越南战争是美国精神上的重大疾病。这个国家继续年复一年地在军事费用上的花费，远远比花在救济国内贫困户的费用还多，这是美国精神的死亡。如果我们忽视这种事实，我们就无法向后代交待。除非我们做出重大且彻底的改变，否则这些会在泰国与柬埔寨发生，会在莫桑比克与南非发生，会在许许多多的国家发生。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我们不及时地站在世界革命的那边的话，我们一定会遭受一场超过普遍价值观的激进革命。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国家，可以领导价值观的革命。我们如果不将和平谈判列为优先于战争追求的话，那会是一场死亡噩梦。革命的时代来临了，全世界的人都起来反抗剥削与压迫。没有衣服和赤着脚丫的人已经史无前例的站了起来。在虚弱而病态的古老世界里，新的正义与平等体系已经诞生，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因而看到了光明。我们西方人必须要支持这种革命。”

金恩总结了其观点说：“为了使美国从漫长而困难的梦魇般的国际纠纷里脱离，我愿意向我们的政府提出五点需要立即执行的意见：

第一，停止在南北越南的轰炸；第二，为了促成谈判的成功，单边的宣布停火；第三，为了避免在东南亚开辟新战场，缩减对泰国的军备，不要干涉老挝(Laos)的事物；第四，接受国家解放阵线是南越人民实际上支持政府的事实，因此任何有意义的谈判和未来的越南政府，必须有他们的参与；第五，根据 1954 年《日内瓦协议》，定下一个从越南撤出全部外国军队的日期。”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是如何来看待这些言论的，但我知道共产党一定对此大叹吾道不孤。金恩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使他离本来就对他毫无好感的美国主流新闻媒体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失去美国白人族群的道德支持。

《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专文讽刺金恩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是“这种蛊惑人心的煽动言论，听起来好像河内电台的广播稿(Demagogic slander that sounded like a script for Radio Hanoi)”。

《华盛顿邮报》宣布金恩“对他的理想，对他的国家，对他的人民来说，他已经是个被贬低的微不足道的人了。(Diminished his usefulness to his cause, his country, his people.)”

在大学时曾经修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金恩被刺杀前，对于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失望到了极点，他三番五次的公开宣传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需要从根本上来进行改革。在私底下，他曾多次对着他的顾问和好友们说，他是支持民主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甚至有一次，金恩公开地说：“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一定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创造财富，或许美国需要朝着民主式社会主义制度前进。”

1968 年开始，金恩全面地介入“脱穷运动”，诉求着非洲裔美国人在经济领域里的公平与正义。可是，这个主题并没有引起其他民权领袖的兴趣，甚至连他最贴身的政治顾问贝阿德·拉斯廷都以师出无名而对此加以反对。

金恩并没有因为得不到同志们的支持而退缩，他独行其事，在全国各处进行串联，准备效法 1963 年华盛顿首都的和平大游行。这次的冲击目标是美国国会，他想发动铺天盖地的多种族人海战术，来包围美国国会，逼使他们通过《保护穷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立法，否则绝不罢休。

1968 年 3 月 29 日，金恩飞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支持从 3 月 12 日开始的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因薪水不公平而举行的清洁工人大罢工。这场大罢工的起因，是在孟菲斯市的一家清洁公司，在一次因坏天气而提前结业时，发给非洲裔美国人员工每人二小时的工资，但却给美国白人全天的工资而引起的。

1968 年 4 月 3 日，金恩的飞机不敢起飞，因为他们接到了有人会用炸弹攻击那架飞机来刺杀他的情报。停留期间，小金恩在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梅森教堂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我曾在高山之巅(I've been to the mountaintop)》，公开表明对于用炸弹来对付终身奉守和平与非暴利原则的他来说，是仁者无敌，是勇者不惧的：

“我是要去孟菲斯市的。有人开始谣传着那种种的威胁，或那种早已遍传的威胁谣言。我们那些白人兄弟们会将我怎么样呢？是的，我现在的确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前面的道路困难重重。

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了。因为我曾经站在高山之巅峰上，我已经不在乎了。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想长命百岁，长寿是有原因的，但是我现在并不顾虑这些。

我只是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是主允许我登上那座大山的。而我也在高山之巅俯览全景，我已经看到那片神圣的净土。我可能不会与阁下同临斯土，但是今天晚上我要告诉阁下，做为人民的我们，将会如愿地踏上那片神圣的净土。

所以，我今天晚上是特别的高兴。我没有为任何事情而担忧，我也不会惧怕任何人，因为在我的眼里，已经看到了主赐给我的荣耀。”

第二天的人间悲剧证明金恩的哀鸣与悲叹不是没有道理的。1968 年 4 月 3 日，他准时抵达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并住进预先定好的“洛林汽车旅馆”的 306 号房间。

这间以价格公道，干净舒适为人所知的洛林汽车旅馆，是由华代尔·贝利(Walter Bailey)开办的小旅店。虽然是一间小店，但由于小金恩和阿伯内西两位名人经常进住而声名远扬，由于两人经常住在 306 号房间，因而该房间有“金恩—阿伯内西套间(King-Abernathy Suite)”的雅号。

金恩刚抵达孟菲斯市，就接到美国法庭的《阻止令(Restrain Order)》，不允许他参加五天后的孟菲斯市清洁工人的不公平待遇而发动的非暴力大游行。

金恩当然不会被这一纸禁令吓倒。他一方面安排他的法律顾问安德鲁·杰克森·杨格牧师(Reverend Andrew Jackson Yong)递状到美国法院挑战这张《阻止令》，一方面继续与孟菲斯市的当地非洲裔美国人社区领袖们策划着大游行的细节，他与同志们商量有关大游行的事务，一直到凌晨 4:30 才返回 306 号房间休息。

在美国近代民权发展史上，杨格是一位以道德、勇气、远见和坚持为诉求的民权领袖，他同时也是金恩的忠实追随者。他于 1932 年 3 月 12 日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出生，母亲戴西·傅勒(Daisy Fuller)是位中学老师，父亲安德鲁·杰克森·老杨格(Andrew Jackson Yong, Sr.)是位牙医。

杨格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备受白人的凌辱和欺负。为了保护自己的两个男孩子，安德鲁·老杨格想到了一个主意，重金聘请了一位武功高深的拳师，教他们两兄弟拳击作为自卫之道。杨格并不喜欢这种自卫的方式，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平凡的真理：暴力解决不了种族歧视的问题。

杨格原本计划着要跟随他父亲的足迹，当一位好的牙医为生，可是在他从美国首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取得牙医的学位后，他的良知使他毅然放弃前途似锦的职业，转向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哈特福德神学院(Hartford Divinity Seminary, Hartford)”进修，并在那里取得了神学硕士学位。

杨格开始在美国各地传教，传教过程中，他有两个特别的收获，第一，在阿拉巴马州传教时，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珍·柴尔兹(Jean Childs)；第二，在他阅读印度圣雄甘地的著作里，悟到“非暴力但不服从抗争哲学”的威力和价值。

1960年，杨格参加以金恩为领导中心的“南方基督徒领袖会议”，逐渐成为这个民权组织的中坚人物。他在美国南方，大力鼓吹非洲裔美国人的登记投票权，几次受到“三K党”的死亡威胁，他领导了几次大型的非暴力和平游行，结果被治安当局数度的拘捕和监禁。

杨格的温和性格和忠厚品德，使他经常成为美国黑白种族冲突的调解人，他的博学和修养，使他轻易地说服了美国国会通过了使人振奋的《民权法案》。金恩于1968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被暗杀时，杨格就在他身边，亲眼看着这一代伟人慢慢地被暴力夺去了生命。

杨格除了为美国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和人权外，还数次出任公职，他当选过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市长，当选过美国众议员，出任过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的驻联合国全权大使。

1968年4月4日的整个上午，金恩并没有外出，而是一边等待着杨格的法庭消息，一边与他弟弟阿尔弗烈德·丹尼尔·威廉斯·金恩牧师(Reverend Alfred Daniel Williams King)、乔治亚·戴维斯(Georgia Davis)、露西·华德(Lucie Ward)和阿伯内西牧师在房间里讨论着非暴力大游行的事务。

1968年下午5:30分，金恩与阿伯内西牧师一齐返回他们自己共用的洛林汽车旅馆306号房间换衣服，准备与大家一起前往比利·凯尔斯牧师(Reverend Billy Kyllies)的家中吃晚饭。

1968年4月4日下午6:00，金恩与阿伯内西牧师走出306号房间，站在房间门口的露台上，与前来接他的杰西·杰克逊牧师、音乐师班·柏兰兹(Ben Branch)和司机所罗门·琼斯(Solomon Jones)聊天。

金恩半开玩笑地叮嘱着正好站在他身边的音乐师柏兰兹说：“班，晚上开会时，你务必唱那首《珍贵的吾主，请拉住我的手(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请唱得尽量好一点。”

琼斯见天气转凉，而金恩衣服单薄，就提议他带上件外套，以免着凉。他没有说话，只是点头称是，然后转身想返回房间取外套。可是金恩永远不再需要外套了，也永远回不了他喜爱的306号房间了，因为他的人生，就在这一刻，已经走到了尽头。

1968年4月4日下午6:01，从洛林汽车旅馆正对面的“贝西·布维尔房间租赁”(Bessie Brewer's Rooming House)的一个房间里，飞来了一颗子弹，准确地射进了金恩的右颊骨，将他的下颞骨击打得粉碎后，顺着方向又穿过了他的颈椎骨，最后停留在了他的肩膀里。

金恩应声倒地，血流满地，昏迷不醒。当他被送到附近的“圣约瑟医院(St. Joseph Hospital)”进行急救手术时，已经为时已晚，回天乏术。1968年4月4日下午7:05，带着他的祝福和慈爱，带着他的希望和理想，也带着他的荣耀和光环，年仅39岁的一代伟人，就此撒手人寰，蒙主宠召，魂归天国。

金恩被刺的真相众说纷纭，而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天下悠悠之口，从法院到舆论，从野史到正传，都千夫所指，都众口一词，说是雷伊干的，我也认为这是一件雷伊单独干出来的罪恶勾当。

属于典型美国白人的雷伊的背景很复杂。他于1928年3月10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斯州奥尔顿市(Alton)，其父亲詹姆斯·杰拉尔德·雷伊(James Gerald Ray)是个不务正业的酒鬼也是个贫民户。

雷伊在小学时代，就有偷窃的不良记录。初中没毕业，就在学校待不下去了，15岁时参加了美国的陆军，被派往德国服役。在德国，雷伊第一次因为“醉酒闹事”和“不守纪律”而被美国陆军军事法庭判刑90天苦工劳役。返回美国后，被美国陆军以“累犯军纪”和“无合适行为能力”为由而逐出军队。

离开美国陆军后，雷伊曾因到处偷鸡摸狗而被数度关进监狱。1949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因为非法入屋偷窃而被判刑8个月。1952年，他又在伊利诺伊州因为暴力抢劫出租汽车司机而被判两年监禁。1955年，他更加胆大包天，因偷盗和伪造美国现金支票而触犯了美国法律，被判三年监禁。在联邦监狱里依然死不悔改，拒绝认错，他的监狱监管主管在他的报告里写下评语说：

“詹姆斯·雷伊明显地没有远见，或者说他是对前途感到恐惧，因此他拒绝向前展望。他曾说如果他不考虑将来的话，他的日子会更好过一点，他看起来对自己目前的监狱生活方式是满意的。”

雷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监狱里，他情愿待在管制严格的监狱里，也不愿调到比较自由的“荣誉农场(Honor Farm)”去，因为那里几乎全是非洲裔美国人囚犯。

1958年，雷伊直接拿着手枪，用暴力抢劫了“克罗格超市(Kroger Grocery Store)”，可是得手后不到20分钟就被拘捕了，法官因为他是个严重的死不悔改的重大罪犯，故将他重判到密苏里州的杰弗逊市入狱20年。

1961年，雷伊在监狱里为了展示他的智慧，决定要越狱，可是因为事情败露，他被关进了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自由的“狱中狱(Hole)”。密苏里州的杰弗逊市监狱当局，将雷伊定位为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力精神幻想狂兼强迫性神经病患者(Neurotic, Obsessive-Compulsive Paranoid)”。

六年后，他被调到监狱的厨房去烤面包，雷伊的机会终于来了。这家监狱的面包部，除了本监狱的需求外，还要供应荣誉农场和附近其他监狱，每天一次，用小货车将烤好的面包运出去。

1967年4月23日，当面包车停在监狱的厨房前，大家将烤好了的面包运送上车时，并没有人想到雷伊已经藏到了一个4尺长，4尺宽的面包箱里，就这样夹杂在一大堆其它的面包箱之间，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监狱。

(待续)

2011年1月24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

